

孫子兵法原文的考證

不應再有所懷疑了

站在中華民族文化上，中國國防建設上，不容我們對於這一部經典——「民族之魂，國防之寶」的孫子兵法有絲毫的懷疑了。

因為我們既用它來禦侮圖存，卻又懷疑它，這是何等矛盾！其影響所及，徒足損害吾民族的自遵心與國防的自信心而已。

任何一代的兵家，無人敢說孫子是一部偽書，我讀過日人研究孫子的著作達數十種，亦無人稍抱懷疑的態度，都是異口同聲的推崇備至。獨自宋代以來，有些文士卻持懷疑的見解，謂孫子非孫武所作，或為孫臏所著，如宋儒葉適因不見左傳有孫子的記載，便武斷孫子之書為春秋末、戰國初的山林處士所為。可是以孫子這樣一部古今無匹的偉著，難道山林處士可以寫得出嗎？至於說孫子不知果為何代人的宋儒陳振孫，徒見其淺薄而已。到了近代，有些學者說是伍子胥所著，更為滑稽。如果這一部傑作是伍子胥手著，伍子胥既做了大官，又能寫出偉著，何不直書己名，既可以炫耀於時，又可以揚名千古呢？我想這是絕對不會有的。又有「中國歷史精神」的作者錢先生亦贊同梁啟超先生的意見，說是齊國孫臏所著，這也是不正確的。考孫子十三篇始於歷史家司馬遷，如史記孫子傳載：「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。」當然以這一個記載為最可靠的。司馬遷為漢代太史公，繼承父業（其父司馬談為漢太史令，職掌天文國史），曾漫遊大江南北，博訪周諮，搜集了不少資料，又懾集金匱石室之藏書，不知根據了多少竹書、木書、帛書等資料來作史記，每一記載，當是根據原始資料，不會捕風捉影，隨便下筆的。看他在史記上引用了不少孫子的話，足見他亦為熟讀孫子的一人。至於秦始皇焚書，係燒掉六經（因儒生根據六經來非議秦皇），並非燒掉雜家的書，孫子為雜家之一，常時秦皇正需要運用它的原理來建設國防，如萬里長城等，及抵抗向北部入侵的匈奴，更不會把它燒掉，故它必定完整無缺。又司馬遷生距周敬王時四百年不到，傳聞上亦不致誤張冠為李戴。而後人憑一時的一知半解或一些文句的推測（有些文句或為後人增入未定），乃武斷孫子為孫臏所著或他人所著，妄圖推翻司馬遷最早而最可靠的記載，以減低孫子的價值，打擊中國民族兵學，陰售其「重文輕武」之奸計，又博得「創見」之名，這樣，試問於學術上有何貢獻？對於民族國家又有何裨益？

孫子的篇數問題

同時，我也是贊同清代「四庫全書」的總纂紀昀、陸錫熊、孫士毅等在孫子提要上的論證，謂孫子「確為武所自著，非後人嫁名於武也。」故唐張守節於史記正義乃引梁阮孝緒的七錄之說：「孫子兵法三卷，十三篇為上卷，又有中下

卷。」以解決此懸案。但依我的研究：除十三篇原文外，其餘六十九篇及圖九卷或為孫子後來所作的遺文，或為其後世孫臧所作的專論，或為後人所作的註解附於其末亦未定（請參閱拙著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一書的總論）。近見有擅把十三篇割裂分為八十二篇，以符漢藝文志的記載，徒見其牽強造作而已。

被外國人譽為世界軍事天才之一的曹操，他為註釋孫子的第一人。他是一個名將，也是一個名作家，根據他的考證，他是贊同司馬遷的記載的。他序孫子說：「吾觀兵書戰策多矣，孫武所著深矣。孫子者，齊人也，名武，為吳王闔閭作兵法十三篇。」以曹操的天才與學問，左右又有無數兵家為助，他既讀其書，又註解其書，既稱十三篇，當有所本，絕非盲目附和司馬遷之言。不過他卻說：「而後世人未知深亮訓說，況行文煩富，行於世者，失其旨要，故撰為略解焉」。可見孫子自流傳於世後，後人寫了許多註解（即訓說及行文煩富，也許是指多出的六十九篇）附於其中，多失其旨要，故他特加刪削，另為註解，成為流傳至今的曹著孫子。但陳振孫因見杜牧說：「魏武帝削其繁剩（或即原有註解，或所多的六十九篇），筆其精粹，凡十三篇，因註解之。」的話，便懷疑十三篇為曹操刪削而成，實因他未讀通杜牧的文章，而杜牧亦未研究清楚曹操的序文，故行文稍有語病而已。

真的，孫武所著兵法是十三篇的。既有司馬遷載稱於前，又有曹操斷證於後，是無可懷疑的了。

孫子的字句問題

不過十三篇經過二千多年的流傳，相信字句上難免不無一些不能存真之處，這是我敢斷言的。從歷代字體的變遷來看，孫子當時所作的十三篇，其字體是用大篆寫的（亦稱古籀，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），後大篆改用小篆（秦李斯作），所有古書又要由大篆改為小篆。漢代又改用隸書（秦程邈作），後又由隸書改為楷書（始於後漢王次仲，備於魏鍾繇），字體上像這樣的改變，而十三篇在每一次的改變又要重寫一遍，在這重寫之中，難免不無錯誤之處。又春秋時所用的寫字工具是用竹條或筆蘸漆或墨寫於竹簡或木板（不是用刀刻，是寫錯時用刀削去）或布帛上，漢以後用紙（自蔡倫造紙始），因所用的工具不同，輾轉謄寫，亦難免不無錯誤處。又當寫在竹簡上時，即一片竹寫好之後，便用皮條或青絲編串起來，成為一篇或一部，日子久了，皮條或青絲斷了，或遭天災人禍以致散亂，後人把竹簡穿錯了，弄得上下文不相連貫，便成為所謂「錯簡」。又因竹簡散亂了，有的遺失，後人無法找全，權把牠編串即來，便又成為所謂「脫簡」，此外也有「斷簡」的，即斷了的竹簡，無從找到的也有。我們今日細讀十三篇，間有此感。明代孫子註釋家劉寅、張賁等就懷疑「軍爭第七」與「九地第十一」有錯簡之處。又孫子的原文，以流傳日久，難免不無好事者流，或自以為是之輩，間加增刪的情事，因之在各版本的字數上間有多少增減之處，現我所根據的係民國三十七年在蘇州虎邱所修建的「孫子十三篇全文碑」，該碑全文共六千一

百零八字，這是我們當時根據最古的宋版孫子，並參照明版孫子，清版孫子（清代考據家孫子五十七世孫孫星衍校訂本）校訂而成，堪稱定本。當時我發現孫星衍的校訂本較之宋版本在字句上稍有增減之處，例如宋版本為「始計第一」，孫校訂本則為「計篇第一」，宋版本為「軍形第四」、「兵勢第五」，孫校訂本則為「形篇第四」，「勢篇第五」等等，又如宋版本為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」（始計第一），孫校訂本：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也，故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民不畏危也。」彼此對照，孫版本則多了三個字。宋版本：「勝者之戰，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，形也。」（軍形第四），孫校訂本：「勝者之戰民也，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，形也。」是孫校訂本又多了兩個字。宋版本：「若驅群羊，驅而往，驅而來，莫知所之」（九地第十一），孫校訂本則多了一句，且在造句上，亦有出入之處，為：「焚舟破釜，若驅群羊而往，驅而來，莫知所之。」等。不過倒不關重要，為數亦有限。中國古書皆有此種情形。雖說十三篇以流傳日久，不無多少與原文相出入之處，起碼總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存真。

孫子作於何地問題

孫子生於周敬王之時，而十三篇究作於周敬王何年？費時若干？無史可考，不能臆斷。不過他不是作於北方的齊國，而是作於南奔之後的吳國，可斷言的。考孫子為齊國孫書之孫（孫書伐莒有功，封於樂安，請參閱拙著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的總論。生長於武將之家，家學淵源，尤喜精研歷代戰史與兵法，在奔吳前，一定幹過武職，打過仗，且具有卓越的天才與實戰的經驗。但因不得志於時，又因田鮑四族謀作亂，故憤而奔吳，奔吳之後，得知於伍子胥，子胥欲薦之吳王闔閭，乃先作兵法十三篇以獻。可見十三篇是作於南方的吳國，今日我們從十三篇的文章上看來，亦可判斷是作於南奔之後的吳國，即今之蘇州。（附註：清孫星衍曾在蘇州虎丘山麓建祠以祀孫子。中國現代兵學界亦曾在該地建碑紀念孫子，見「蘇州虎丘孫子紀念亭追記」。）

最近偶一讀孫子兵勢第五：「激水之疾，至於漂石者，」這句話，不禁有所感。長江以南，地勢多山，與長江以北、黃河流域一望千里的平原迥異，南方有些河流在大雨中，其水勢真如天上而來，「漂石」是很普遍的現象。又孫子當時在由北到南的奔吳旅途中，通過千山萬水，這位哲人不免到處考察地理，及觀察自然現象，故他在十三篇中甚多論及山地的形勢。而十三篇之作，也許在這孤寂冷靜的旅途中，已打下腹稿。至於北方平原，地勢平坦，河流緩慢，開封以東的黃河，就是最好的例子，「漂石」是不可能的，其實亦無石可漂。孫子當時為得到吳王闔閭的用已，故多用南方的地理名詞去激發吳王，如虛實第六說：「越人之兵雖多，亦奚益於勝哉？」九地第十一說：「故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，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。」又說：「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，當其同舟濟而遇風，其相救也，如左右手。」同樣合乎情理，取喻切近動聽。故梁啟超先生等謂為「齊孫子」（孫臏）所作，即作於北方的齊國則不對。梁啟超先生是近代中國一個大學

術家，但在這一點上殊欠高明。正如曾國藩為清代一個大軍事家，但他卻不信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，破龍沮以囊沙壅水的事（見「曾氏日記」），使我不得不在拙著「兵學隨筆」上予以辯正，這也許是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吧！

居今之日，我們應如何致力發揚孫子以供實踐，再來動筆考證孫子，似無多大意義。惟因有感於世人往往被那似是而非的見解所迷惑，故特作斯篇，並以就正於高明！